



土默川
革命英雄故事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序 言

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开卷阅读，我们就会看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册上，所纪录和流传的最主要最动人心魄的内容就是爱国主义四个大字。

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风采，从班固的“爱国如饥渴”到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从岳飞的“以身许国，前赴后继”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秋瑾的“无限伤心家国恨”到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从董必武的“捐躯为国是英雄”到朱德的“誓拚热血固神州”……历代仁人志士喊出的爱国主义心声汇聚成千钧雷霆，撼人心魄！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是无法找到与之相匹配的称重砝码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子孙就是在爱国主义的精神风范中成长起来，延续下去的。爱国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英雄，无论是在抵御外侮的正义之战中，还是兴邦立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中

华民族都有无数值得骄傲的优秀人物，成为民族的楷模和典范，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成为后世者享之无尽的巨大精神财富。

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爱国主义更是一面高扬着的无比亮丽的旗帜，在它哗啦啦的飘舞声中，我们的民族精神无比振奋、民族的凝聚力无比牢固。中华民族向 21 世纪大步迈进的新的梯队，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指引下，目标更加明确、步调更加一致；中华民族正走向它的更加辉煌的明天。

我们的党历来都把爱国主义的教育放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正是由于我们党的重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文明传统以及民族的凝聚力才得到不断加强，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民族。

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十分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并把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基地、教材、队伍等硬件建设做为重点工作来抓，抓出了成效，抓出了业绩。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于此是下了大功夫，化了大气力的；因之也就获得了大成效，取得了大业绩的。继去年全区“五个一工程”中“一本好书”获奖后，又一次把图书编写的重点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基点之上，无疑是颇具远见之举，是务其所重务

其所急的。《土默川革命英雄故事集》做为“一本好书”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必将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这本书会成为我们呼市地区乃至全自治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乡土教材的。

《土默川革命英雄故事集》顾名思义，讲的是土默川上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这块沃土上的人物的故事，将使我们少些陌生感、多些亲切感，读来有趣、读后受益。可以说把这些故事编辑成书使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传之后人、功德自在。

我遵嘱为此书做序，所以先睹为快，阅后深感心潮难禁，激奋不已。以乌兰夫同志为代表的一代英雄人物在土默川大地上重笔浓彩写下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从中感受到他们的高尚人生和伟大人格的力量，他们的故事中充满着无限的精神营养，必将有益于我们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

对革命先辈来说，“为伟大事业献身的人，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而我们呢？我们没有理由不成为爱国的中华民族的方阵中忠实的一员！

一九九五年秋 于呼和浩特市
郝存柱

目 录

生亦人杰、死亦鬼雄

——革命烈士多松年的故事…………… 张秀北(1)

大河骄子

——李裕智的故事…………… 高文华(26)

北国雄鹰

——荣耀先事略…………… 陈贵敏(56)

青山碧血

——刘洪雄革命烈士斗争故事…………… 陈贵敏(82)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贾力更烈士的故事…………… 林 木(107)

青山英烈 塞北忠魂

——高风英烈士的战斗一生…………… 高培莹(133)

塞北古城的星星之火

——吉雅泰同志地下革命活动片断
…………… 毕力格太(153)

傲骨铮铮

——高布泽博的革命故事…………… 陈贵敏(173)

平绥路地下

——毕力格巴图尔抗日活动片断…………… 毕勒格(195)

一个老警官的故事

——毕力格巴图尔同志的几个生活片断
…………… 毕力格太(211)

大青山上一青松

——姚喆司令员二三事…………… 林 青(219)

浩气长存

——奎壁同志的故事…………… 代 林(234)

李森的故事…………… 云晓光(256)

中华赤子

——乌兰夫在革命战争年代里
…………… 李连成(269)

黄厚在大青山…………… 云晓光(332)

青山赤子

——杨植霖同志的光辉一生…………… 武俊平(357)

后记…………… (383)

生亦人杰、死亦鬼雄

——革命烈士多松年的故事

张秀北

多松年(1905—1927) 原名多寿，蒙古族，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郊区麻花板村人。1918至1923年就学于归绥，为归绥学运中坚，曾参与组织归绥学生1921年砸毁日资电灯公司和1923年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1923年秋，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在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关怀培养下，翌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成为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一。1925年4月，与乌兰夫、奎璧等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党组织负责人。1927年4月，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代表之一，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遭执政于张家口的奉系军阀通缉。8月初，为传达“五大”精神，布置隐蔽工作，营救被捕同志，只身返回张家口，不幸被捕。狱中，不为利诱，威武不屈。中旬，被敌人用5根1尺多长的铁钉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塞外重镇张家口有一座雄伟的城门——大境门。城门上方，嵌着“大好河山”四个苍劲端庄的大字。近半个世纪以来，无数来到这里的人们，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一遍又一遍瞻仰这字、这门、这曾经被英烈鲜血淬染的城墙。追思，化作一曲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久久回响——1927年，杰出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内蒙古地区早期党

的领导者之一多松年，就是在这里，以耿耿正气、铮铮铁骨同反动派战斗到最后一息，为党的革命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那年，他只有22岁。

少年报国志

1905年寒冬，多松年出生在当时的归绥城北郊麻花板村一户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里，起名叫多寿。

多松年是在清贫和饥苦中度过他的童年时光的。他从小就帮着大人做活，砍柴、烧水……样样都行。十岁那年，懂事的多松年提出要“上学认字”。备尝生活艰辛的父母亲虽然为难，但还是把他送到了城里的席力图召。那里有他的六老爷——好学、正直、识文断字的六喇嘛。白天，他帮着六喇嘛烧水送茶侍候大喇嘛；晚上，六老爷教他认字、写字，给他讲历朝历代“官逼民反”的故事；义和团扶清灭洋，蒙古族抗“垦”起义，……听来听去，小松年总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斗争的结果都没有使穷苦人翻身呢？

一天晚上，多松年蹲在六喇嘛旁边帮他烧火。炉膛里的火苗一蹿一蹿的，映红了两个人的脸，小松年又向六老爷提出了他的疑问：“穷人多灾多难，天下的穷人又比富人多，为什么总是干不过他们呢？”

六喇嘛默默往灶里添了些柴，叹了口气对松年说：“你还小，先要好好念书。等将来学成了也当个官，就没人敢随随便便欺负你啦！当了老百姓，就会一辈子受穷受欺压……”

“不！我不当官。”松年坚决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想念书啊？念书的人都是为了做官。”

“我想多学点本事，想知道穷人怎么干才能不受欺负，好替咱老百姓讲理……”六喇嘛拉过小松年，爱抚地摩挲他的头，心里越发喜欢这个踏实、聪明、有志气的孩子了。

1918年春，六喇嘛把多松年送到归绥石王庙小学读书。学习一段时间后，又转学到土默特高等小学（座落在归绥城南头的高小，简称“南高”）就读。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完全小学，教师中有许多文化较高、思想进步的青年。其中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经常给同学们讲一些时政大事、国内国际情况和一些能帮助人分析问题的社会科学知识。多松年常常听得入了迷，下课了都不忍离校，继续和几个意趣相投的同学讨论到很晚……在这里，他更多地感受到了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蹂躏的惨痛以及千百万劳苦大众长期受压迫、受剥削又反抗无门的悲苦。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使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坚定了寻求真理、为大众翻身得解放而奋斗的决心。

在南高，多松年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功课，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当时，他一直住在六喇嘛那里。冬天，六喇嘛的小厢房又冷又潮，四壁挂满了冰霜，有时连取暖的柴禾都没有，更不要说很好的照明了。为了在晚上多看会儿书，多松年就顶着寒风飞雪踏上封冻的冰面到苇塘去采蒲棒以点着照明用，一不小心就掉进冰窟窿里，湿透了下身。可他顾不上这些，依然去摘了一大把蒲棒回来。尽管他因此病了好几次，但那一闪一闪昏暗的火光依旧是他每晚夜读的伙伴。后来，朋友们给他带来一只煨牛粪取暖的小盆，小屋也就成了青年们讨论时事、探寻斗争之路的场所……同学们不来的时候，多松年就自己坐在火盆旁默默读书，苦思着穷苦人求解放的道理。

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了塞外古城归绥。时代的感召，报国的热忱，使年轻的多松年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当地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他关心时事，浏览各种报刊关于时局的报道；当他和同学们得知“二十一条”中竟有五条出卖

内蒙古利益的条文时，顿时义愤填膺。

1921年，天津商人沈文炳勾结日本公司，利用日资在归绥办电厂、电话局，企图挤垮民族工业，垄断这里的电力、电讯事业。9月间，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学生们组织了示威游行，多松年带头高呼“抵制日货，自己办电厂，不要日本人办”的口号，直冲归绥大北街沈文炳的电厂、电话局，同归绥中学、北高等校学生一同捣毁了厂房材料设施。他手拿利斧，将市内郊外已经埋设的电杆一一劈倒。学生们的爱国行动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

1923年春天，绥远学联发起组织抵制日货的爱国群众运动。这时，多松年已是“南高”里年龄较大的高年级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已在这个稳重的年轻人心里深深扎根，催他成熟、催他奋进。外表的沉静、沉着却掩不住他内心那火热的激情。虽然他很少做抛头露面的工作，但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向周围的市民们讲解抵制日货的道理，或者默默地抄传单、贴标语、糊小旗，每件小事都做得令人满意。人们看得出，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人是个“靠得住”的人。作为学生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多松年很快成了宣传鼓动队伍里的骨干。

归绥市面上有一家新开设不久的大商号，叫“盛记”洋行，是专售日货的大百货商店。学生宣传队来了之后，老板不但态度蛮横恶劣、拒不接受宣传劝告，还摆出一付十足的洋奴架式教训人。学联决定采取行动。代表们先进去交涉，要求交出日货，立即查封，洋行老板却照样不理不睬。愤怒的学生们一拥而入，见日货就向外扔，什么玻璃器皿、化学玩具、洋布洋绸、钟表仪器……凡是贴着日本商标的，全部扔到大街上。里面扔出一件，外面就动手砸一件，最后索性连玻璃柜台也给砸了个粉碎。当天下午，学联决定乘胜追击，派出代表和商会谈判，定出了“市内商号凡存日货者，一律登记封存”等几条协议。

从那以后，商人们再也不敢公开贩卖日货了。后来，归绥中学秉承“上级”旨意，以种种借口开除了部分学生的学籍，又以组织旅行、提前放假等手段削弱了“学运”和“学潮”。但多松年和他的战友们却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热情越来越高。每天一放学，多松年就带领同学们臂带袖章、手执小旗，到火车站各商号执行检查日货的任务。在这场斗争中，多松年受到了初次的锻炼。

踏上革命征途

1923年秋。一列老式火车在炫目的红霞中缓缓驶出归绥车站，迎着朝阳驶向东方。青山巍巍，唤起人赤子般的依恋情怀。而那滔滔黑河水，急速向后隐去，波翻浪涌的澎湃之声似乎依稀入耳，激荡着一代志士的报国雄心。

蒙藏学校是什么样子呢？听说那里从前曾经是镇守三关的总兵吴三桂的府邸……一位面容清秀、瘦削文静的年轻人坐在车窗前，右手托腮眺望窗外，深深沉浸在思索中。他眉宇间透发出明净悠远的神采。他就是和乌兰夫、李裕智、吉雅泰等40余名蒙古族青年一起奔赴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多松年。

十七岁那年，家里父母作主给多松年找了媳妇。结婚之后，多松年发现这个叫云兰兰的贫苦农家姑娘勤劳朴实，为人厚道，两个人的感情越处越好。新婚蜜月，多松年也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月，就又返回学校继续他的学业。

1923年夏天，多松年四年的“南高”学习生活结束了。这时，北京蒙藏学校到归绥招生，毕业考试前十名的学生可以保送进入蒙藏学校，他以优异成绩进入了被保送之列。

告别了亲人，告别了家乡，多松年和他的同学们带着新的向往和追求，踏上了新的征途。

列车飞快地向前行驶。穿过平坦的土默川原野，经过断壑深沟

的黄土高原，羊群在山坡上象白色的花朵一样开合舒展，农人们在梯田里辛勤地劳作……多松年感到祖国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人物山川无不可亲可爱，然而正是这大好河山、这善良勤劳的人民却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反动派的蹂躏！想到这些，年轻的多松年百感交集。身旁的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地听学兄荣耀先讲述四年前北京“五四”运动的盛况，他的注意力也被吸引过去，只听荣耀先继续说道：“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政治思想非常活跃。蒙藏学校虽然僻静也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再加上那里的教师都是从各地聘请的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只要积极上进，到蒙藏学校读书会帮我们找到一个新天地的。”事实上，荣耀先正是受蒙藏学校的委托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的秘密指派回家乡招生的。临行前，北京区委明确指示：“我们需要大批的新生力量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

列车开到青龙桥一带时，松年的心情更加不平静，他的思绪象车轮一样，不停息地滚动着……那峻拔的山峰、雄伟的长城，无不使他心潮澎湃，精神昂扬振奋。他想：到了北京，又能看许多新书，接触许多新人新事，懂得许多新的道理了。国家的弊端在哪里？穷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道路何处去寻……到了那里，自己心里这些疑问一定能得到解决；在那里，一定会遇到更多的良师诤友，可以与他们探讨天下大事……一定要在蒙藏学校好好学几年，掌握新知识，掌握斗争的武器，和那些欺压劳苦大众的王公、牧主们一干到底！

从此，蒙藏学校古老而宽敞的大院里，就多了一个文静中透着坚定和干练的年轻人。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校园的小树林里长时间地读书，读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哲学等各个方面。看他读累了，就一个人倒背着拿书的手，在树林里缓缓地踱一会儿，大脑却依然在飞快地转，思考着书本上、现实中碰到的各种疑难。有时，想通了，他高兴地把双手放前来，右手拿着书轻轻地叩击左手，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若遇上反复琢磨却仍旧难解疑团的时候，他就双

眉紧锁，线条分明的嘴唇显得分外冷静和刚毅。1923年下半年，许许多多不上课的日子，多松年就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多松年和同学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尤其是与来自同一家乡的乌兰夫、赵诚、佛鼎等人更是亲密无间。多松年不爱多说话，别人谈话聊天，他总是默默地听上一会儿，待别人问到他的想法时，他才谦虚地笑笑，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见地，只有在这时，人们才会看出，这真是一个老成内秀的小伙子。

正当多松年把全部身心投入学习之中时，火热的斗争生活又吸引他走出平静的校园。

一天刚下课，同在蒙藏学校学习的李裕智匆匆跑到教室，告诉多松年家乡来了请愿团，请求在京学生予以声援。

原来，北洋军阀政府用清丈土地的办法在归绥、武川、萨拉齐、托克托等地大量掠夺蒙古农民的土地，这一暴政激起了整个土默特各阶层的不满，特别是底层农民的强烈反对。广大蒙古族群众推出代表进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停止清丈土地，归还蒙古族农民被掠夺的土地。

多松年立即和同学们碰头，决定坚决支持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并分头发动学生和串联其它学校。

第二天，蒙藏学校的学生随请愿团一道去蒙藏院请愿。多松年走在队伍前面，带领大家一路高呼“反对官府掠夺蒙人土地！”“还我蒙民土地！”等口号。沿路不断有群众关切地为他们让开道路，有的还加入到队伍中来。请愿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蒙藏院递交了请愿书，申诉了蒙古族群众的正当要求。接连十多天，蒙藏学校的学生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也派出代表参加请愿团，兄弟院校有力地支援了这场斗争。

当初，蒙藏院总裁、喀喇沁右旗亲王贡桑诺尔布筹办蒙藏学校的本意是培养那些为王公贵族服务、统治少数民族群众的奴才、爪

牙。可这里却成为对他们进行反抗运动的摇篮，这是北洋军阀政府和王爷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学生们的这场正义行动，使北洋军阀政府大为恼火，便下令取消学生官费，撤掉同情学生的章武校长的职，新派了一名姓王的官僚政客任校长，企图以此制服学生，使其听任摆布。

多松年和同学们针锋相对开展斗争，拒不接受新任校长。

在同学们不屈不挠的斗争面前，北洋军阀政府既恼怒又有些畏惧，只好作出让步，重新派了一名温和派的知识分子来任校长。不久，又迫于压力恢复了学生官费。

通过这次斗争，多松年再次清醒地认识到，和北洋军阀及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决不妥协。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

党的培养

蒙藏学校的读书生活紧张而充实。来自偏僻塞外的多松年广泛涉猎，丰富自己的知识，同时结交良师。他的眼界和心胸都豁然开朗起来。

当时，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非常关心这批蒙古族青年的进步，多松年他们一入学，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同志便和他们广泛接触，师生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多松年和这些革命者在一起，谈学习谈生活谈未来，听他们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听他们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并在他们的教诲下读到了共产党创办的《向导》、《政治生活》、《新青年》等革命刊物。邓中夏同志还向多松年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解释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和他们共同探讨国家前途和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

经过党团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多松年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很快他就认准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穷苦大众最好的带路人，没有党的

领导就不会有斗争的胜利。他也更加深刻地懂了一个道理：受苦受压迫的是天下所有的穷人，要想彻底翻身解放，就不能把眼光只盯在自己的家乡，要和全国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团结起来，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地跟反动派干！

邓中夏和黄日葵，这两位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是天才的组织者和宣传家。他们平易近人的作风、诚恳真挚的态度，很快赢得了多松年等一批蒙族青年的信任和爱戴。多松年一看到他们来，就寸步不愿离开，和他们攀谈，向他们请教。

一天，多松年等几个青年正在寝室里讨论得热烈，邓中夏和黄日葵两位同志面带微笑推门进来了。同学们高兴地围上前，和他们打招呼。接着，他们坐在一起，从学校的眼前事谈到国内国际形势，谈到中国的出路问题，气氛热烈得感动人。

邓中夏说：“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咱们中国就象一条千疮百孔的船，在雾气茫茫的大海上找不着方向。有人认为，船应该向西开，象英国法国那样，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有人说，这船要往南边去，搞无政府主义，你们这里的人可能听过不少这样的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张往北，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你们赞成哪个方向呢？”

多松年和他的同学们陷入沉思：是啊，祖国象一条船，那么共产党就是舵手，我们每个人都是准备与狂风暴雨搏击的勇敢的船员……想到这里，他兴奋地抬起头说：“向北方……”然后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邓中夏同志。四目相对，如同两颗真挚的心撞击在一起，迸发出温暖、明亮的火花。

邓、黄两位革命者以敏锐的目光观察、关注着这批青年人的成长。他们很快就看出这些蒙族同学中哪些人是可以信赖的，哪些力量将成为革命的火种。很短的时间内，多松年被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转眼到了1923年冬天，多松年作为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中的一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为内蒙古青年运动史上第一批蒙古族团员。

形势在继续发展，蒙藏学校也越来越不平静。各种党派组织经常派人到学校兜售他们的主张，如国民党右派在蒙藏学校的代表白云梯，社会民族党代表蒋元虎，无政府主义代表吴雅晖等，都试图与共产党争夺这批青年。但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这些追求进步的蒙古族学生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随时准备投身到解放劳苦大众的斗争中去。

加入青年团以后，多松年渴望着更多更快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憧憬着自己能早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

也就在多松年入团不久，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在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中开展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组织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秘密进行学习。

一个冬日的下午，邓中夏、黄日葵两位同志照例和蒙藏学校的这批蒙族学生一起，谈论到很晚。吃过晚饭后，同学们陆续回去自习，只有多松年被留下来。

“我们想再和你谈几个问题。”邓、黄两人说。

“你们很信任我，我太想听听你们的指导了！”

他们三人一起走到校园的操场边，在石阶上坐了下来，初冬季节，天空那么晴朗，繁星闪烁。四周又那么宁静，只有微风吹着枯黄的蒿草瑟瑟作响。

“松年，这段日子，我们彼此了解信任，心贴得很近。我们知道，你一直在苦苦寻求真理，渴望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我们想介绍你参加马列主义小组，李大钊同志将亲自给你们讲课，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见，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邓中夏的一番出自肺腑的话，使多松年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静夜中，他紧紧握住邓中夏的手，眼里闪着泪光，一个劲儿地点头。

此刻，这个从小备受艰辛的蒙族小伙子心潮起伏，万分感慨。多少个苦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多少年黑暗中苦苦的探索，多少回面对现实的沉重压抑……一下子化作千言万语要倾泻而出，却又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他终于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低沉而有力地說道：

“作为一个寻求光明和真理的蒙古族青年，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和党、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

不久，多松年就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在宣武门附近的一所古庙里见到了李大钊，在那里聆听他讲课。夜晚的月光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大殿被荒草包围着，里面若隐若现闪着微弱的灯光。谁也想不到，在这荒郊野外人迹罕见的古刹里，有人正在点燃和传播革命的火种！

多松年注意地观察到，李大钊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留着浓密的上髭、短短的平头，身着长袍、戴黑边近视镜，表情极为和蔼可亲。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就递给青年们每人一本小书，微笑着请他们先看看，接着便开始讲课了。

这本小书就是《共产党宣言》。书名上面，印着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的头像。

握着这本薄薄的小书，多松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力量。

多松年专注地开始听讲。从王公牧主的剥削讲到历代人民的反抗，从苏联十月革命讲到中国的“五四”运动，李大钊深入浅出、高理于事的讲解那样简明生动，那样清晰易懂，使在坐的年轻人心更明、眼更亮了！多松年双眼望着老师那慈祥的面容，心中涌起无限的敬意。多么可敬可爱的老师啊！他的思绪随着老师的讲解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汲取着丰富的给养。